

第6典 学术

第7典 科学技术

第8典 文艺

中华文化
通志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历史沿革

第1典

文化沿革

第2典

地域文化

第3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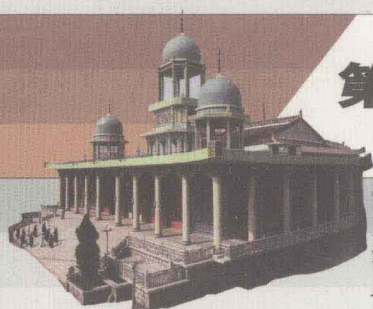
民族文化

第4典

制度文化

第5典

教化与礼仪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伊斯兰教志

秦惠彬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9 典

【宗教与民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伊斯兰教志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 公 室 主 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伊斯兰教志

作者简介

秦惠彬,1940年生。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研究系,获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著有《中国的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史》(合著)等。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志是在历时与共时相统一的视角下撰写的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部专志。全书共五章,上限在唐,下限迄于1949年。第一章传入与历史沿革,专述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本志的特色是:把中国伊斯兰教史视为社会史来叙述,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宗教载体的发展史,有这样一个历史链条:唐“蕃商胡贾”—五代“蛮裔商贾”—宋“土生蕃客”—元“色目人”—明“回回”。第二章教派与组织,在叙述“六信”、“五功”与中国伊斯兰教派之后,着重论述了制度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道路的规范与制约。第三章经籍与教义,对中国伊斯兰教重要的汉文经籍作了诠释;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伊斯兰教独有的哲学——教义学体系的成立,阐明了这一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具体内容,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这是本志的精华。第四章人物,介绍元代著名穆斯林儒学家、清代著名教义学家、民国著名经师(或教育家)的生平传记。第五章文物古迹,介绍中国著名清真寺、陵墓、道堂、拱北和碑刻等资料。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传人与历史沿革	9
第一节 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东传中国	9
一、伊斯兰教的创建与大食帝国向中亚的扩张	9
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若干主张	11
第二节 唐宋时代伊斯兰教	22
一、伊斯兰教的入华路线	22
二、中国与大食的交往与军事接触	24
三、穆斯林的在华留居	38
四、穆斯林的一般状况	53
五、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伊斯兰教	79
六、宋廷与哈拉汗朝的关系	107
七、伊斯兰教在辽、金	109
第三节 元代伊斯兰教	117
一、“元时回回遍天下”	117
二、穆斯林的一般状况	125
三、蒙古宗室的改宗	131

第四节 明清时代伊斯兰教	137
一、回回民族的形成	137
二、明初太祖《百字赞》和成祖的《护持文》及武宗的“崇回”	146
三、清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政策	148
四、穆斯林的反清斗争	149
五、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	152
第五节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	166
一、中国内地伊斯兰文化的复兴	166
二、中国内地伊斯兰教社团的建立	173
三、“侮教事件”	178
四、新疆地区伊斯兰教	181
 第二章 教派与组织、制度	 195
第一节 基本信仰与礼仪制度	195
一、“六信”	195
二、“五功”	199
第二节 节日与一般习俗	203
一、节日	203
二、一般习俗	204
三、关于礼仪的历史记述	206
第三节 历代对伊斯兰教的管理制度	208
一、蕃坊	209
二、回回掌教哈的所	213
三、蕃学	214
四、科第	217
五、三掌教制	219

六、教务人员呈报审批、注册登记制度	221
七、乡约制	222
八、清真寺的敕修	223
九、教内的管理制度	223
第四节 非教务性团体	225
一、东亚清真教育总会	225
二、留东清真教育会	225
三、清真保路同志协会	226
四、清真教育会、清真学会	227
五、清真学社	228
六、中国回教学会	228
七、穆友社	229
八、追求学会	229
九、伊斯兰学友会	230
十、中国回族青年会	231
十一、中国回教青年学会	232
十二、回民教育促进会	232
十三、中国回教文化协会	232
十四、中国伊斯兰布道会	233
十五、中国回教文化学会	233
第五节 教派	234
一、概况	234
二、教派(“三大教派”)	235
三、苏非教团—门宦(“四大门宦”)	238
四、伊合瓦尼同门宦之间的斗争	242
五、新疆地区的教派	253
六、中国伊斯兰教派的共同特点	255

第三章 经籍与教义	257
第一节 中国伊斯兰教义学	257
一、唐宋元代关于伊斯兰教之认识.....	257
二、明代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	269
三、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创建.....	271
第二节 经籍	289
一、《古兰经》的介绍与翻译.....	289
二、“汉刻它布”.....	297
第三节 教育与科技	318
一、经堂教育.....	318
二、古代科技.....	325
 第四章 人物	333
第一节 著名的教义学家	333
一、王岱舆.....	333
二、马注.....	334
三、刘智.....	336
四、马德新.....	337
第二节 元代著名的穆斯林学者	338
一、赡思.....	338
二、萨都刺.....	338
三、丁鹤年.....	339
四、买间.....	339
第三节 中国伊斯兰教新式教育的倡导者	340
一、王宽.....	340
二、马邻翼.....	343

第五章 文物古迹	346
第一节 清真寺	346
一、概况.....	346
二、名寺.....	349
三、道堂.....	371
第二节 碑刻与陵墓	371
一、寺碑与墓碑.....	371
二、名墓、拱北与麻札	374
 大事年表	388
 参考文献	394

导 言

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明末清初是至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教义学体系。这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基本完成。成就这番事业的,是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的教义学家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主张伊斯兰教必须因时因地有所革新。这种革新不仅涉及仪规方面,也包括教理在内,而且后者更为重要。王岱舆主张的“理不圆融机不活,空读圣贤万卷书”,就是这个意思。马注认为,“经文屡降”,就是为着“圣教改弦”。即使在穆罕默德时代,变也是经常。他告诉信众,伊斯兰教本身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为“权教”,所谓“权”者,就是变;一为“因教”,所谓“因”者,就是变的方向。变,因时因地而变。变对于宗教本身来说当是题中应有之义。马注还打一比喻,譬如一个人,他若长住广东,必然学会粤语;他若久居日本,必然要穿和服。伊斯兰教因时因地之变,也如此这般之自然。这一时期,一些有见识的教义学家开始用汉语译讲经典、以传统思想诠释经典。关于是否可用汉语译经、讲经问题,中国伊斯兰教内是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的。当时,有的教义学家认为,这样做是“哈他”(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一种教义学意义上的错误)。王岱舆反驳了这种见解,认为“哈他”指的是对于宗教基本精神的违背。至于用什么语言译讲经典、如何阐扬教理教义,则

不属于“哈他”范畴。

中国伊斯兰教义学所开辟的整体方向是“以回附儒”，即适应中国社会大的文化氛围。依靠“逻辑”或“理性”，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得出结论，在教理方面，它同儒家的关系是“教有二教、理无二理”，“教道同源”。

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写作了一批“汉文经典”（教内称其为“汉刻它布”）。这些著述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例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五功释义》、《天方至圣实录》，等等，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在清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空前强化了。以宗教为旗帜而爆发的穆斯林反清斗争就是证明。中国伊斯兰教意识到了“我之为我”的那些东西。但是，从整体方向上看，中国伊斯兰教并没有丝毫背离其始初路线。这时，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更加注重“中阿并授”，“汉刻它布”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吸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清真释疑补辑》是一部向外宣教的书，带有颇强的辩教性。它认为，在中国，伊斯兰教义思想“凡与儒者合者”才是最有价值的。

清代中后期，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大都是教内经师、阿訇等。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与效应远不如其先辈。

民国初年，内地伊斯兰文化开始复兴，新式学校在穆斯林集居区如雨后春笋般普遍兴起。约在其后二十几年，《古兰经》的汉文全译本开始出版。这一时期在穆斯林当中，造就了一大批既精通教理又有很深汉学功力的知识文化人。他们出身穆斯林，但不是宗教职业者，多为教授学者、记者编辑。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很大，足以掀起社会性的轰动。他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这种研究完全地真正地冲出了清真寺的樊篱，在社会的大背景中去把握中国伊斯

兰教,因而受到教外人士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切。

民国时期已有非穆斯林参与研究工作。他们或者倡导、董理其事,或者置身研究之中,作用是非常独特的。有的非穆斯林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成为穆斯林学者和社会知识界的一面旗帜。陈汉章、陈垣两位学者开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研究之先河。他们的文章《中国回教史》(1926年,《史学与地学》第1期)、《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8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1号),滋养了几代学人。陈垣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分类研究的构想与设计,至今仍有启迪意义。他们的成就终于使中国伊斯兰教史(也仅只这个侧面)可以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被建树起来。在把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几代学人又洒下了辛苦的汗水。

稍后,在这方面,白寿彝的建树较多。他的《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等,都可以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断代史去读。此外,金吉堂写作了《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到了四十年代,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史有了大部头的作品问世。首推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1940年)。此外还有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1940年)、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史纲要》(1946年)等。这些著述有很高的价值,都是试图在勾勒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时,梳理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这些作品应该在社会科学的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

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内创办了许多具有宣教性质的刊物。后人粗略统计有上百种之多。但延续时间较长、发行覆盖面较广的不多。其中可以谈说的,当属《月华》,创办于1929年,由位于北平东四清真寺内的“成达师范学校”编辑出版。在社会上,一般学术刊物也重视了伊斯兰教特别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在白寿彝的直接参与下,于三十年代后期出版了两期“伊斯兰研究”专号(第五卷第11期、第七卷第4期)。《月华》及《禹贡》两期专号所载